

攻坚:土豪围寨与中央苏区的拔“白点”斗争

饶伟新

(厦门大学 历史系 福建 厦门 361000)

摘要:明清时期赣南乡村宗族构筑的大量“围寨”建筑并由此形成的“聚族而居”的乡族围寨势力,至中央苏区时期演变成土豪劣绅盘踞的据点(所谓“白点”),对中共的革命进程造成严重障碍和威胁。中共革命武装因此而发起的攻打土豪围寨的斗争,即从最初的较量,到随后苏区腹地的“攻坚”之战,再到后来苏区后方的清剿之战,贯穿中央苏区革命的全过程。这一过程既反映了现代阶级革命如何深受传统土豪势力制约的历史真实,也从另一侧面说明了中央苏区革命失败的原因。

关键词:中央苏区;乡村围寨;土豪势力;阶级革命

中图分类号: K269.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79(2013)01-0073-09

Assaulting Fortified Positions: the Local Tyrants' Stockaded Villages and Struggle of "Seizing White Points" in the Central Soviet Areas

RAO Weixin

(Department of History,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Fujian 361000, China)

Abstract: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he rural patriarchal clans in the southern part of Jiangxi Province constructed a large number of stockaded villages, wherein clan members lived together, forming a kind of force.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Central Soviet Areas, these stockaded villages evolved into the strongholds (the so-called "white points") occupied by local tyrants and evil gentry, causing serious obstacles and threats to the revolutionary process of the CPC. So the revolutionary armed forces of CPC launched the struggle of attacking local tyrants' stockaded villages, from the initial contests to "assaulting fortified positions" of the hinterland of the Central Soviet Areas, finally to "the war of clearing up" of the rear of the Central Soviet Areas, throughout the whole process of the Central Soviet revolution, which reflected not only the historical truth that modern class revolution was restricted deeply by traditional local tyrant forces, but also explained the reasons of the failure of the Central Soviet revolution.

Key words: the Central Soviet Areas; stockaded villages; local tyrant forces; class revolution

一、前言

1920-1930年代,中共在赣南开展土地革命、建立中央苏维埃政权并取得丰富革命经验的同时,也

收稿日期:2012-11-13

基金项目:香港特别行政区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卓越学科领域计划(第五轮“中国社会的历史人类学研究”(编号:A0E/H-01/08))

作者简介:饶伟新(1973-)男,江西信丰人,博士,厦门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乡村社会文化史。

遭遇巨大困难,特别是在国民党军队的五次围剿之下,红军主力最后被迫退出中央苏区而进行长征。苏区革命的这一失败,固然有国共力量对比悬殊以及中共自身内部路线斗争和军事策略失误等因素^①,但也跟赣南地区固有的乡村社会结构和传统乡族势力集团对革命进程的影响和制约息息相关^②。特别是苏区内部的土豪劣绅及其靖卫团武装,依托乡村中大量的围屋、山寨,构筑“反动堡垒”(即所谓苏区内的“白点”),胁迫“劳苦群众”抗拒和骚扰革命,对中央苏区的革命进程造成严重障碍。这股土豪势力及其所依托的围屋山寨,是在明清以来乡村宗族发展以及为应对地方动乱而“聚族自保”过程中逐渐演变而来的,具有浓厚的宗族、乡族武装色彩和社会属性,因而其对中共革命的障碍,不仅直接体现在军事上的对抗,严重威胁苏维埃政权的建立与巩固,更透过传统的宗族或乡族关系纽带,无形地干扰了苏区社会动员和阶级斗争的顺利进行。尽管中共革命者曾一度集中红军主力,对赣南乡村中的土豪围寨势力展开“攻坚”,拔除了苏区内部大量的“白点”,但由于其根基深厚,分布广泛,红军的“攻坚”过程异常艰难,直到退出苏区之前,中共革命者始终未能彻底根除土豪围寨势力对苏区革命的困扰和影响。

中共党史文献的记载及有关回忆录显示,土豪围寨势力的问题给当时的中共革命者留下了深刻“印象”。然而今日史学界对此却无多注意,专门的研究更是罕见^③。有鉴于此,本文利用中共党史文献、回忆录、文史资料以及族谱等有关史料,拟先说明赣南土豪围寨的由来和社会属性,然后着重考察和分析苏区革命武装攻打土豪围寨(拔“白点”)斗争的阶段过程,尝试从乡村社会史与现代革命史相结合的角度,探讨以乡村围寨为中心所构成的土豪地主武装对中央苏区革命发展进程的影响。

二、苏区土豪围寨的由来与社会属性

本文所说的“围寨”,就其空间座落和功能特点而言,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兼具生活居住和军事防卫功能的“围屋”(或统称“土围子”),包括“围”、“围寨”、“围屋”、“土围”、“土楼”、“土堡”等各种名称和形态的民居建筑,此类“围屋”民居一般建在村落之中,围墙厚实坚固,设有炮楼、枪眼,平时作为居住场所,战时可防守自卫;另一类则是建在村落附近山头上的“山寨”(或作“山砦”)、“石寨”,是作为战时避乱的场所,通常设有寨墙(围墙)、寨门等防御工事和临时简易的住屋,可据险而守。在赣南(乃至整个闽粤赣三省边区)的广大山乡村落中,分布着大量的围屋、山寨(本文通称之为“围寨”),特别是在赣南南部的龙南、定南、全南、安远、寻乌等县,围屋数量尤多。据1990年代的统计,龙南全县现存围屋达200余座,安远县南片五个乡现有100多座,而全赣南现存围屋总数估计至少在五六百座以上^④。事实上,在土地革命到来之前,赣南北部雩都、兴国、宁都、石城、瑞金、会昌等县(即中央苏区核心区域)围屋或土围子的数量亦非常可观,而今现存者相对之少,主要是因为苏区时期红军打掉和拆除了

^① 有关这方面的最新研究可参见黄道炫《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原因探析——不以中共军事政策为主线》,《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5期;《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军事策略考察——以广昌战役为中心》,《历史研究》2006年第2期;《中共、粤系、蒋介石:1934年秋的博弈》,《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1期;《国共第三次“围剿”与反“围剿”探微》,《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5期;《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

^② 近年来史学界比较注意从社会史的角度重新审视中央苏区革命史,有关研究例如有:饶伟新《论土地革命时期赣南农村的社会矛盾》,《厦门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黄琨《中共暴动中的宗族组织(1927—1929)》,《史学月刊》2005年第8期;黄道炫《苏区时期的“赤白对立”——阶级革命中的非阶级现象》,《史学月刊》2005年第11期。

^③ 就笔者管见,仅有中共赣州地委党史工作办公室编著的《赣南人民革命史》(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版)中有一节专门叙述中央苏区红军三次反“围剿”之后,于1931年10月至1932年2月开展打“土围”、拔“白点”的斗争过程(参见该书第175—180页),但也缺乏对苏区时期红军攻打土豪围寨的全过程进行考察。

^④ 参见钟荣昌《安远客家围屋》,《安远文史资料》第六辑,安远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1993年编印,第43—45页;韩振飞《赣南客家围屋源流考——兼谈闽西土楼和粤东围龙屋》,《南方文物》1993年第2期;万幼楠《赣南客家民居试析——兼谈赣闽粤边客家民居的关系》,《南方文物》1995年第1期。

很多,譬如1931年10至1932年2月间红军就“消灭了于都、胜利、宁都、石城等地土围石寨大小二百余处”^①。苏区时期,各地土豪劣绅正是凭藉此类围寨,据险顽抗红军,成为中央苏区中的“白点”。

苏区土豪围寨的由来,可以追溯到明清时代。笔者先前的研究曾经指出,赣南乡村围寨的兴起和发展,与明清时期的社会动荡直接相关,并大致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即在明中叶前后闽广山贼“寇乱”、明末清初之际政局动荡以及晚清咸同年间太平军战乱三个历史时期,赣南各地乡民为应对地方动乱,在宗族长老或地方士绅的领导之下,先后发起了三次建围筑寨运动^②。苏区各地的土豪围寨,大多就是上述动荡历史时期特别是明末清初和晚清咸同年间建成而留存下来的。如龙南县太平堡东水坳下(今龙南县杨村镇乌石村)的赖氏“磐石围”(俗称乌石围)建于明万历天启年间^③;龙南县太平堡象牙湾赖氏“蓝田围”、定南县伯洪堡樟木岭徐氏“龙田围”、于都县赖村镇(今属宁都县)东塘水西黄氏“金牛寨”、瑞金县瑞林镇稳村张氏“乌仙寨”,均构建于清初顺治年间^④;安远县镇岗乡老围村陈氏“东生围”、“尊三围”、会昌县胡氏“清平围”,于都县马安乡上宝钟氏“宝溪围”(上宝土围)、赖村镇水西黄氏“均安围”,瑞金县瑞林镇下坝陈氏“湖溪甲土围”、“廖集甲土围”、瑞林镇长洲赖氏“老屋学堂土围”,石城县屏山镇陈氏“陈坊寨”,均建于晚清道光或咸同年间^⑤。

明清动荡时代构筑的这些乡村围寨,通常规模宏大,结构坚固,防御设施完备,其目的是为了避乱和聚族自保,也因此它的建筑费时费力,往往需要动员家族集体财力和花费数年时间方能完成,有的围寨甚至是叠经数次建造才得以完工建成。如安远县龙安堡岗头(今镇岗乡老围村)陈氏“东生围”,呈方形,长91米,宽73米,占地面积6643平方米,四角均建有高出一层的炮楼。围屋高7.2米(炮楼高9.3米),墙体厚1.3米,共有4层,1至2层均用沙石砌成,以桐油、糯米捶石灰灌缝,干后坚硬如铁。3至4层,墙体外壁镶火砖,内壁砌土砖。围内共有368间房屋,有9个天井,18个厅子,俗称“九井十八厅”。此围由陈氏长老陈朗庭兄弟联手创造,于道光二十二年至三十年先建成围内房屋;至咸丰初年,因“肆布谣言,时势大乱”,乃于咸丰三年至六年加建围屋外圈,构成坚固之外层墙体,是有咸丰六年五月“李元古造反”、咸丰七年七月“长毛贼来乱”和咸丰十年八月“花旗贼来犯”,“乡邻皆躲入我围”,“计三千余人得保平安”;乱后,又于同治五年至七年添建围内正厅。至此,“东生围”全部建成^⑥。又如于都县赖村镇(今属宁都县)“金牛寨”,由当地东塘、水西两支黄氏捐资共创,“寨之尾横阔十余丈,……寨之首横阔约数丈”,“可建房屋无数,容人数万”;先是“由明至清初(顺治)甲申岁(1644)修整数次,以防寇盗,避於斯者悉保无虞”^⑦;“至(康熙十三年)甲寅(1674)崖逆倡乱,遂邀集本家殷户公堂捐资重加修整”^⑧;

① 《江西苏区中共省委工作总结报告(一、二、三、四月总报告)(1932年5月)》,江西省档案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425-426页。按:胜利县是1932年1月红军攻破于都马安乡上宝土围后设立的苏区县,范围包括于都北部和兴国东北部的几个乡镇,县委、县政府先设在于都北部的银坑平安沙里坪,1933年春迁驻银坑镇上。

② 饶伟新《明清时期华南乡村聚落的宗族化与军事化——以赣南乡村围寨为中心》,《史学月刊》2003年第12期。

③ 赖经国《东水磐石围记》,《(龙南)桃川赖氏六修族谱》,乾隆四十四年(1779)刊本。

④ 参见:康熙6年,《(蘭田)基址记》,《(龙南)桃川赖氏六修族谱》,乾隆四十四年(1779)刊本;顺治5年,《(四世祖裔孙英四公嗣孙竖造龙形围簿序)》,《(东海堂)定邑徐氏(景发公位下仲宽公派下英四公房系)续修族谱》,1995年编印;《(印山金牛寨记)》,《(零阳水溪黄氏十三修族谱)地卷》,民国37年刊本;乾隆14年,宋溶《(有九张公家传)张之秀《(乌仙寨难纪)》,《(瑞金张氏族谱)卷十一》,1995年编印。

⑤ 参见:同治7年,陈朗庭《(建造东生围详记)》,《(颍川堂陈氏族谱)》,1995年编印;诚民《(革命遗址——尊三围)》,《(安远县文史资料)》(第一辑),安远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1985年编印,第20-27页;[清]王驥《(胡公隆盛隆兄兄弟善行合传)》,同治《(会昌县志)》卷31《(艺文志)》,〔清〕刘长景修、陈良栋、王驥纂,清同治十一年(1872)刻本,台北:成文出版社1989年影印本,第1221页;同治3年,钟坝《(宝溪围序)》,《(宝溪钟氏九修族谱)》,1995年编印;黄颂清《(水西均安围记)》,《(零阳水溪黄氏十三修族谱)地卷》,民国37年刊本;《(湖溪廖集两甲土围)》,《(颍川瑞金市下坝陈氏十修族谱)》第35本,1995年编印;同治3年,赖作舟《(中洲老屋学堂土围记)》,《(瑞金瑞林廖溪赖氏七修族谱)》卷十六,1993年编印;〔16世孙〕陈熙谦《(廷礼公房陈坊寨避乱记)》,《(石城陈坊陈氏七修族谱)》卷十,民国27年(1931)刻本。

⑥ 同治7年,陈朗庭《(建造东生围详记)》,《(颍川堂陈氏族谱)》,1995年编印;钟荣昌《(安远客家围屋)》,《(安远文史资料)》(第六辑),安远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1993年编印,第43-45页。

⑦ 《(印山金牛寨记)》,《(零阳水溪黄氏十三修族谱)地卷》,民国37年刊本。

⑧ 康熙35年《(修建金牛寨合约字)》,《(零阳水溪黄氏十三修族谱)地卷》,民国37年刊本。

“迨至咸丰(五年)乙卯(1855) 贼蜂四起 族人开纬、阅忒、阅种、上进、品超倡首,乃将本姓捐资三千有奇,东塘房十捐之六,水西房十捐之四,同心协力,首尾用坚石堆厚,墙壁高峻,不一年而工告竣。越(咸丰七年)丁巳(1857)春,发贼犯境,不啻蚁众,无论本姓异姓,概避斯者约数万,於五月内叠围三次,攻取甚急,满寨尽力坚守,炮毙贼命不计其数,贼乃各退境外,而寨则保全无恙矣”^①。咸丰七年之乱后不久,心有余悸的水西房黄氏又“多方敛集大众及各房公堂殷实所置田租每担捐资三百文,各家红丁每丁捐资三百文,助力五工,共汇钱银数千有奇”,在本村松子墩(今宁都县赖村镇围足村土围里)建造围屋一座,名曰“均安围”,“盖取合族子姓有备无虞,均得安全之义也”^②。诸如此类由乡村宗族集体出资建造的乡村围寨,不仅因其坚固的防御工事而成为家族“聚族自保”的军事堡垒,更因其(特别是围屋)作为家族共有财产而成为家族成员(包括子孙后代)共同分享或共同居住使用的生活场所,结果强化了宗族聚居的程度和宗族内部的血缘纽带关系。因此,笔者认为,明清时期赣南地区普遍兴起的乡村围寨,具有明显军事化、宗族化的历史特点和社会属性,反映了明清以来乡族武装势力的发展^③。

晚清以后,特别是进入清末民国初年,由于军阀混战,匪患猖獗,以及乡族械斗的盛行,赣南乡村宗族重新修整围寨,以应对动荡的时局。如于都县葛垌乡澄江村谭氏土围(又称谭氏小城)于民国二年重修了城门^④,马安乡上宝钟氏也于民国四年合族捐资重修了本族“宝溪围”(即上宝土围)^⑤。这一时期,随着近代枪枝的装备和使用,赣南乡村围寨的军事化程度也进一步提高。更重要的变化是,1927年大革命失败和国共分裂后,以乡村围寨为中心的乡族武装开始演变为反共的豪绅地主武装。1928年7月中共的一份江西工作报告指出,赣南各县各乡村的豪绅地主响应国民党政权的反共号召,纷纷组建“清乡委员会”、“反共委员会”、“靖卫团”等各种反共组织,以应对中共的农村革命^⑥。据1930年4月中共江西省委巡视员张怀万(江汉波)的赣西南巡查报告,其时“兴国有靖卫团四百人左右;赣县靖卫团及商团五、六百人;……安远有靖卫团八百余人,七百余枪;南康、上犹、崇义、大庾各有靖卫团二三百人不等;零都、宁都、信丰、石城、瑞金、会昌均各有三百至五百不等”^⑦。这些土豪劣绅的靖卫团武装,大多依托乡村围寨的坚固工事来对抗中共苏维埃政权,诚如1930年10月中共赣西南特委书记刘士奇在给中共中央的综合报告中指出:“地主阶级的武装(赣西地区的)靖卫团多半跑到山上去(……)赣南方面的,则死守土围子,如秦始皇修万里长城一样,经常强迫农民修土围。”^⑧

正是上述分布广泛、具有宗族社会基础和乡族武装传统的土豪围寨势力,对中央苏区的革命进程造成很大的威胁和困扰,其严重程度丝毫不亚于国民党正规力量对中共的挑战。这可以从红军攻打此类土豪围寨的过程得到说明。

三、最初的较量

中共在建立和巩固中央苏区的过程中,同时面对打退国民党正规军队进攻和肃清苏区内部土豪地主武装的双重军事斗争,前者集中表现为前后五次反“围剿”战争,后者则主要表现为攻打土豪围寨(“白色据点”)的拔“白点”斗争,苏区革命之有关史料特别是1931年12月创刊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对此留下诸多记载和大量报道。这一斗争虽在规模和激烈程度上不如五次反“围剿”战争,但却贯穿中央苏区革命的全过程。

① 《印山金牛寨记》,《零阳水溪黄氏十三修族谱》地卷,民国37年刊本。

② 黄颂清《水西均安围记》,《零阳水溪黄氏十三修族谱》地卷,民国37年刊本。

③ 饶伟新《明清时期华南乡村聚落的宗族化与军事化——以赣南乡村围寨为中心》,《史学月刊》2003年第12期。

④ 韩振飞《赣南客家围屋源流考——兼谈闽西土楼和粤东围龙屋》,《南方文物》1993年第2期。

⑤ 民国4年《复修土围捐款鸿名》,《宝溪钟氏九修族谱》,1995年编印。

⑥ 《江西工作近况——综合性报告(1928年7月8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第2页。

⑦ 《张怀万巡视赣西南报告(一九三〇年四月五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第184—185页。

⑧ 《赣西南(特委)刘士奇(给中央的综合)报告(一九三〇年十月七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第360—361页。

双方最初的较量,可以从1929年初朱毛红军转战赣南开辟中央革命根据地算起,至1931年9月第三次反“围剿”取得胜利为止。其实,中共革命队伍对赣南山区土豪地主的围寨武装并不陌生,1927年8月南昌起义之后南撤到江西南部的革命队伍就已领略其“厉害”,如粟裕大将回忆说“我们这支南昌起义保存下来的部队,在江西境内,赣南山区,边打边走。我们从武平经(会昌)筠门岭、寻乌、安远、三南(定南、龙南、全南)等县境,向信丰以西的大庾岭山区挺进。……一路上经常遇到地主武装、反动民团及土匪的袭击和骚扰,特别是三南地区地主土围子和炮楼很多,不断给我们造成威胁和损耗。”^①1929年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从井冈山转战赣南闽西,在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和建立地方红军的同时,也开始了攻打土豪围寨的斗争,主要在于都、兴国、瑞金、石城一带展开。如1929年10月,赣南红军第27纵队攻打于都北乡银坑的上谢土围,但打了七、八天也未能打开;次年4月27日纵队在红四军、红六军的支援下打退于都北乡马安上宝(上堡)土围靖卫团几千人的进攻,接着又前往攻打于都东乡固院潭头圩的土豪靖卫团土围,活捉土豪曾节芳^②。1930年7月,红四军在汀州(长汀)改编为红一军团后,陈毅率该军团第22军分兵赣南各地,开展消灭白色据点的斗争。其中2纵队(司令员唐天际)分在瑞金九堡攻打“土围子”,很快就把“土围子”解决了,不久转到于都赖村(今属宁都)打“土围子”;10月后又调到兴国改编为第64师(师长唐天际),攻打兴国七坊的“土围子”,打开之后就开往吉安进行第一次反“围剿”^③。于都赖村的“土围子”非常坚固,红22军第2纵队并没有打开;紧接着,谭震林等率红三军团第5军(由红12军改编)开过去继续攻打该土围,但也没有打开。时任红5军党委秘书长的李志民将军回忆说“记得宁都赖村(原属于都县)的土围子很顽固;……一军团去打,我们三军团也去打(当时我在三军团五军当秘书)。打了好多次也没有打开。因为其围墙筑得很高,有几尺厚,我们的子弹打不进去。而他们在围墙上挖有枪眼,打出来好厉害。我们无掩护,又无炮弹,土围子的周围又都是水田,挖不得坑道。所以,攻了好多次也没有攻下来。”^④1930年11月,由于国民党军队的第一次“围剿”开始,红5军只好放弃攻打赖村土围的斗争,转而投入反“围剿”的战斗^⑤。红5军的前身红12军曾在罗炳辉的率领下,于1930年6月和第一次反“围剿”之后的1931年2月两次攻打石城县屏山的两座土豪山寨——陈坊寨、李家寨,不过也都未能攻克^⑥。

以上种种事实表明,在这最初较量的时期,中共革命武装(包括正规红军和地方游击队)攻打赣南土豪围寨的成效非常有限,其原因主要有三:

其一,正规红军在进入赣南初期(1929年初至1930年10月)尚处于游击状态,不熟悉赣南地方情形,攻打土豪围寨的经验不足,而在后期(1930年11月至1931年9月)又连续忙于应付三次反“围剿”战争,无法集中红军主力乘势攻克土豪围寨。

其二,刚刚组建起来的地方革命武装特别是游击队,不仅军事上力量薄弱,组织松散,而且政治上幼稚,阶级斗争意识不明确,在动员群众打土豪过程中常常犯工作路线上的“非阶级”错误,造成苏区群众与土豪地主之间不分阶级以及苏区群众与白区群众之间赤白对立的现象。如1931年9月中共赣西南特委的工作总结报告指出,在1931年1月第一次反“围剿”之后,虽然“苏区赤白间杂的现象(在赣东南)已用大力去肃清(如打土豪地主靖卫团的土围山寨白色割据等)”,但是,“过去地方武装特别是游击队很多都发生过错工作的路线,主要是盲动主义乱杀乱烧,不做地方群众工作,缺乏宣传,打土豪只为游击队本身,不把当地豪绅财物发散给各地贫苦工农,这种错误往往被豪绅地主利用去争取群众,说游击队是土匪,并利用群众来和游击队对抗,造成群众非阶级的赤白对立以抵抗革命势力向外发展,这种

① 粟裕《千万里转战》,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33页。

② 华伟仁《赣南红军第二十七纵队的成立及其活动》,《于都文史资料》(第二辑),1991年编印。

③ 唐天际《红二十二军分兵在赣南》,《回忆中央苏区》,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99-100页。

④ 李志民《中央苏区反一、二、三次大“围剿”的片断回忆》,《回忆中央苏区》,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63-164页。

⑤ 江华《追忆与思考——江华回忆录》,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11页。按:江华时任红5军第1师第3团政委。

⑥ 温昌义《红四军拔除石城南区的“白色据点”概况》,《石城县文史资料》(第一辑),1986年编印。

现象在……赣南的兴国、雩都、信丰等地表现很严重”。因而难以对土豪围寨势力形成有效的分化和瓦解^①。

其三,土豪地主武装在革命初期阶段恰恰处于强固有力时期,他们利用传统的宗族或乡族社会基础,盘踞土围山寨之内,可谓以逸待劳,以守为攻,以退为进,形成苏区腹地顽固的“白色割据势力”。

因此,在这一时期,中共革命武装与土豪围寨势力之间的斗争才刚刚开始,真正的较量还在后头。

四、苏区腹地的“攻坚”之战

1931年10月至1933年1月,是红军集中主力部队攻打中央苏区腹地土豪围寨的高潮阶段。1931年9月中共取得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从赣西南到赣南再到闽西的苏维埃县份几乎连成一片^②;在此基础上,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于瑞金;1931年12月宁都暴动成功后,“江西苏区”的版图就跨有18个县的范围,并“占有七个全县,七个县城(兴国、雩都、寻邬、会昌、瑞金、石城、宁都、广昌),……东南边与闽西苏区完成(全)联系起来,打成一片”^③。至此,中央苏区大体形成。但是,在中央苏区内部,特别是在其最核心的地带,即连接赣西南与闽西苏区的兴国、于都、宁都、石城、瑞金等县的广大乡村地区,大量土豪地主武装盘踞在各处土围山寨中,不仅严重威胁着中央苏区政权的巩固,也影响群众动员和土地革命的顺利开展。当时红军训令即指出“土围子炮楼是土豪最后营垒,不消灭这一最后营垒,许多的农民群众还是不敢起来。为要肃清赤白对立,夺取广大群众,并捉得土豪筹得款子,必定要完全消灭土围子炮楼。”^④因此,打破和肃清这些土豪围寨,全面赤化苏区和巩固苏维埃政权,就成为三次反“围剿”之后红军最紧迫的军事任务。为此,1931年10月14日,红一方面军专门发布了由朱德和毛泽东联名签署的《收集攻打土围炮楼经验的训令》,要求“各军接到此训令后,务将各军、师、团直接打土围子攻炮楼的指挥员的实际经验,兵力布置,工作的方法,如挖地洞的方法,用的工具,爆炸的药种药量,爆炸的效力,收效的成绩,详细的开会讨论后汇集起来报告总部,再由总部参谋处加以讨论,汇集有效的有经验的方法编为筑垒攻城教范,训练红军。这是目前万分需要的,限训令到十日内汇集转报,勿延为要”^⑤。

1931年9月底、10月初,红一方面军(包括红一、红三军团)各军主力部队从兴国开往闽西长汀集结,进行短暂休整和筹措给养之后,随即分兵展开攻打苏区腹地各处土豪围寨的斗争,其中以石城、于都、宁都等县的战斗规模最大,打掉的土豪围寨最多。如从1931年10月至1932年1月初,红四军(辖第10、11、12师)分头攻破该县南乡的七处山寨和五处土楼,即包括洋地的三坑寨、洋地寨,屏山的石耳寨、猪仔寨、李家寨、陈坊寨、红石寨,以及横江的烟坊土楼和秋溪的上排子、上村、中公太、下村四个土楼。这些土豪地主武装的山寨、土楼,大多囤积大量粮食和枪枝弹药,易守难攻,如山坑寨、李家寨、陈坊寨均历时一个多月才被攻破;而红石寨地势险要,寨顶宽敞平坦,不仅周边乡村的土豪劣绅纷纷携带家眷及大批财物躲上此寨,甚至连国民党石城县党部、县政府、县靖卫团以及宁都、瑞金、宁化、广昌等县的一些豪绅地主也相继逃上红石寨,全寨拥有一千五百多兵力,是当时石城县最大的反动堡垒,红四军历时两个多月,至1932年元旦才攻破此寨,“石城团匪从此完全肃清”^⑥。

① 《赣西南的(综合)工作报告(赣西南特委,1931年9月20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第407、418页。

② 《江西的中央苏区(特约通讯,一九三一年九月三日江西瑞金发)》,《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第392页。

③ 《江西苏区中共省委工作总结报告(一、二、三、四月总报告)(1932年5月)》,《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第425-426页。

④ 朱德、毛泽东《收集攻打土围炮楼经验的训令(一九三一年十月十四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一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257-258页。

⑤ 朱德、毛泽东《收集攻打土围炮楼经验的训令(一九三一年十月十四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一卷),第257-258页。

⑥ 《红色中华》第四期(1932年1月6日)第二版,北京:中央档案馆1964年影印本;温昌义《红四军拔除石城南区的“白色据点”概况》,《石城县文史资料》(第一辑),1986年编印,第3-13页;孔宁都《攻打红石寨》,《石城文史资料》(第四辑),1991年编印,第7-11页。

与此同时,即从 1931 年 10 月起,红三军(辖第 7、8、9 师)则分兵攻打于都县北部车溪乡马鞍石(马安石)、汾坑乡汾坑圩及翰林头、仙下乡花石寨、曲洋乡仙人坝、马安乡上堡(上宝)、桥头新圩以及葛坳、银坑、赖村等乡村各地的土豪围寨,截至 1932 年 1 月底,至少攻克几十处土围山寨^①。对此,1932 年 2 月 3 日出版的《红色中华》第八期报道说“在最近一、二月内,工农红军第三军就消灭了几十只土围石寨,把雩都桥头一带的白匪,完全肃清,把豪绅地主的武装,缴得干干净净,使广大的苏区,完全打成一片,最主要的有田头、骡脚寨、头□、西汾、新圩、小水坑、马安石、头巾寨、长龙寨、大罗屋、高杏圩、石人老寨、花石寨、西坑尾寨、汾坑圩、骡子寨、礼汾、仙娘寨、蛇蝎、上堡等二十余寨。”^②其中座落在于都县北区马安乡上宝村的上堡(上宝)土围,可算是当时于北地区最大的土豪武装反动堡垒。该围名曰“宝溪围”,由晚清上宝钟氏家族集资建造,始建于咸丰八年,至同治三年完工建成,规模宏大,结构坚固,其围墙“厚计一丈,有□□磐石之固;高逾数丈,无狼奔蚁附之忧;中广一□,有空隙可以进退,墙背护屋,有□□可以止栖”^③;围内生活设施完备,如祠堂、房屋居室、厨房、粮仓、杂物间、水井等一应俱全^④。1928 年以来,钟氏土豪劣绅及其靖卫团盘踞其中,甚至周边一些土豪地主武装也逃到里面,成为“兴(国)、雩(都)、干[赣](县)一带的土豪老巢”;红军及地方游击队曾多次攻打该围,但均未成功,直到 1932 年 1 月 21 日才被红三军攻破;随后红军发动附近工农群众花了三天时间将围内粮食等财物挑运搬空,并将围墙拆除,不久即在以上宝为中心的于北地区成立了新的苏维埃县——胜利县,从而打开了于都、兴国、宁都、瑞金等县的通道,把四县边界乃至整个赣西南与赣南、闽西苏区连接了起来^⑤。这大概是红军攻打于北地区土豪围寨所取得的最大成果。

这时期,红军主力及地方红军在宁都、瑞金等地攻打土豪围寨的斗争,也取得一定成果。如在 1932 年 2 月间,红三军分兵一部击溃或攻克信丰的新田梧桐土围和大阿团岭、老屋下土围子^⑥;刚组建的胜利县独立团和宁都县各地的游击队则进攻或围困宁都县虎井、观音、王竹(黄竹)、翠微峰等土围山寨的靖卫团匪,且于 2 月 28 日攻破瑞金丁陂土围^⑦。据 1932 年 5 月《江西苏区中共省委工作总结报告》的统计,自 1931 年 10 月至 1932 年 2 月,红军主力在地方革命群众的配合下,前后“四个月中消灭了于都、胜利(于北区)、宁都、石城等地土围石寨大小二百余处,江西苏区乃打成一片,白点消灭了百分之九十五”^⑧。可见,尽管中央苏区的范围在 1931 年 9 月大体形成,也尽管随后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但是只有到了 1932 年 2 月,随着苏区腹地大批土豪围寨的攻破和肃清,中央苏区才在某种意义上真正得以建立和巩固起来。

不过必须指出,在苏区腹地,特别是于都北部与宁都、瑞金三县交界的赖村、葛坳以及宁都县境内的一些乡村,仍有不少土豪围寨尚未攻克。因此,从 1932 年 3 月起,正规红军的一部分队伍配合地方红军对这些地方的土豪围寨继续实施围困和攻打,至 1933 年 1 月,陆续攻破雩都北乡赖村(今属宁都县)附近的崖背土围(1932 年 3 月 3 日)、东塘岩(1932 年 3 月)、钟鼓岩(1932 年 3 月)、长石寨(1932 年 3 月)、圆石寨(1932 年 3 月 14 日)、金牛寨(1932 年 3 月 15 日)、莲子塘土围(1932 年 8 月 2 日)、葛坳杨梅头土围(1932 年 8 月 2 日)、东塘崖石寨(1932 年 9 月 3 日)、赖村土围(1932 年 11 月 7 日),宁都的云

① 具体情形详见《红色中华》第五期(1932 年 1 月 13 日)第四版、第六期(1932 年 1 月 20 日)第五版、第七期(1932 年 1 月 27 日)第六版的有关报道。

② 《红色中华》第八期(1932 年 2 月 3 日)第八版。

③ 同治 3 年,钟坝《宝溪围序》,《宝溪钟氏九修族谱》,1995 年编印。

④ 咸丰 8 年《筑(宝溪)围驳地言明字》,《宝溪钟氏九修族谱》,1995 年编印。

⑤ 《红色中华》第七期(1932 年 1 月 27 日)第六版;黄华炳《攻打上堡土围与运粮拆围的回忆》,《于都文史资料》(第二辑),1991 年编印;岩松《胜利县》,《于都文史资料》(第三辑),1992 年编印。

⑥ 《红色中华》第十一期(1932 年 2 月 24 日)第六版;徐友万《回忆在信丰的几次战斗》,《回忆中央苏区》,第 106 页。

⑦ 《红色中华》第十二期(1932 年 3 月 2 日)第五版;《红色中华》第十三期(1932 年 3 月 9 日)第六版。

⑧ 《江西苏区中共省委工作总结报告(一、二、三、四月总报告)(1932 年 5 月)》,《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第 425-426 页。

石寨(1932年4月24日)、观音寨(1932年7月29日)、黄竹寨(1932年9月12日)、赤面寨(1933年1月14日)等土豪围寨^①。

应当指出,由于这一时期红军主力部队入闽作战,攻打中央苏区腹地残余土豪围寨的任务主要由力量相对薄弱的赣南地方红军(如胜利独立团、宁都游击队等)来承担,因此斗争异常艰难,其中于都的赖村土围、宁都的观音寨、黄竹寨、赤面寨等,自1932年2月起就处在地方红军的围困之中,但直到1932年下半年甚至1933年1月,对峙了大半年的时间才被攻克。但无论如何,这一阶段(1932年3月—1933年1月)地方红军攻打土豪围寨的斗争,可以看作是前一阶段(1931年10—1932年2月)“攻坚”战的继续,由此基本肃清了中央苏区腹地(包括石城、瑞金、于都、宁都、兴国等县)的“白色割据势力”,从而进一步巩固了中央苏区政权。

五、苏区后方的“清剿”之战

1933年1月以后,红军攻打土豪围寨的斗争集中在中央苏区南线的会昌、安远、寻乌等县。这一地区是中央苏区的后方,1931年9月第三次反“围剿”胜利之后就已普遍建立苏维埃政权,但乡村中大量的土豪围寨不仅直接威胁着苏区后方政权,也对苏区腹地构成潜在威胁。因此,清剿苏区后方的土豪围寨势力就成为这一时期南线地方红军的主要任务之一。

早在1931年10月至1932年这段时间里,红军主力配合地方武装曾攻克南线的一些土豪围寨,如1932年6月下旬,会昌警卫连游击队和红军之一部围攻安远南半县的土围子,迫使三个围寨投降革命^②;至同年8月初,红军配合地方武装又打下安远县南区的九个反动土围,包括“最顽强的卢屋土围”在内^③。但是直到1933年初,随着中央苏区腹地的土豪围寨基本肃清,在中共提出“攻寨是巩固苏区向外发展的重要工作”的指示下^④,南线地方红军和游击队才对安远、寻乌等县的土豪围寨展开连续的清剿斗争。如1933年1月23—24日,寻乌红军和游击队连续攻破寻乌南部的老鸦寨、留车土围和石坑土围^⑤;3月4日,赣南红军攻克寻乌东部“最刁顽的反动据点项山(寨),并同时攻克南门山土围”^⑥;3月31日至4月6日,红军独立团配合安远地方武装,接连攻克安远县南部镇岗乡的半天坑(半天塘)、永水坑、龙屋村三个土围子^⑦;4月4日,寻乌挺进队攻开和焚毁寻乌南部留车乡的芳田三坑寨^⑧;4月30日,安远南区游击队配合地方武装攻克“南区(凤山镇)最顽强最反动的井邱围”^⑨;7月17日,寻乌挺进队又攻开留车乡大同马塘村炮楼^⑩;8月初,赣南红军又连续攻克安远县南部孔田乡山头土围和太平坑土围^⑪;9月1日,赣南游击队攻克寻乌县上四甲之片寨这一“最天险最反动顽强的堡垒”^⑫。经过这一连串的斗争,南线的土豪围寨势力受到了沉重打击,不仅有力地巩固了中央苏区后方政权,还扩大了整个中央苏区的范围和战略纵深。1933年8、9月间在会昌县城郊文武坝乡彭逢村新成立的中央苏区粤赣

① 《红色中华》第十三期(1932年3月9日)第六版、《红色中华》第十四期(1932年3月16日)第六版、《红色中华》第十九期(1932年4月28日)第二版、《红色中华》第三十期(1932年8月4日)第一、二版、《红色中华》第三十期(1932年8月4日)第一版、《红色中华》第三十三期(1932年9月13日)第六版、《红色中华》第三十四期(1932年9月20日)第四版、《红色中华》第四十期(1932年11月14日)第二版、《红色中华》第四十七期(1933年1月14日)第一版;熊佐《独臂政委赖传贤》,《于都文史资料》(第三辑),1992年编印。

② 《红色中华》第二十六期(1932年7月7日)第四版。

③ 《红色中华》第三十期(1932年8月4日)第三版。

④ 《红色中华》第五十一期(1933年2月10日)第二版。

⑤ 《红色中华》第四十九期(1933年2月4日)第四版。

⑥ 《红色中华》第六十期(1933年3月12日)第二版。

⑦ 《红色中华》第六十七期(1933年4月8日)第一版、《红色中华》第七十期(1933年4月17日)第四版。

⑧ 《红色中华》第六十八期(1933年4月11日)第一版。

⑨ 《红色中华》第七十七期(1933年5月8日)第二版。

⑩ 《红色中华》第九十八期(1933年8月1日)第二版。

⑪ 《红色中华》第一〇四期(1933年8月22日)第二版。

⑫ 《红色中华》第一一一期(1933年9月21日)第一版。

省,即主要由会昌、门岭(会昌寻乌间)、寻乌、安远等7个苏区县所构成。

不过应该看到,在此之后中央红军历时一年的第五次反“围剿”期间,南线残余的土豪围寨势力仍不时骚扰苏区后方,特别是在反“围剿”失利已成定局的后期,一些地方的土豪围寨势力甚至主动出击红军,大有卷土重来之势。如1934年7月,安远县北区天心、重石、东坑一带的地主靖卫团蠢蠢欲动,顽抗革命,会昌红军独立营前往围剿,与其发生激战,结果打退地主武装,占领天心里土围,并拆毁东坑土豪的堡垒^①。可见,中央红军最后于1934年10月被迫退出中央苏区,不能不说与苏区土豪围寨势力的顽抗息息相关。

六、余论

以上所述表明,中共从进入赣南(乃至闽西)开辟中央革命根据地,到建立和巩固中央苏区,再到最后退出中央苏区,始终受到赣南乡村土豪围寨势力的抗拒和牵制。而红军攻打土豪围寨的斗争,从最初的较量,到随后苏区腹地的“攻坚”之战,再到后来苏区后方的清剿之战,既构成了中央苏区军事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反映了中央苏区革命史的曲折进程。这是研究和了解中央苏区史所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红军攻打土豪围寨的曲折过程,不仅体现在军事上双方之间的长期较量,更表现在土豪围寨传统的宗族或乡族关系给中共革命武装所带来的困扰。我们注意到,被中共视为“反动堡垒”或“白色据点”的乡村围寨,聚居其中的人群应该说原本是具有自我认同的家族或乡族共同体。但在中共看来,他们中除了少数反动的土豪劣绅(豪绅地主),大多还是“被欺骗”的“劳苦群众”,因此中共在攻打这些“反动堡垒”的过程中,不仅在军事技术上不断收集和总结经验,更重要的是在舆论动员上大力宣传和强调阶级斗争的意识和策略,一方面号召“围寨”内的“劳苦群众”觉悟起来,自发加入革命队伍,分化、瓦解土豪围寨势力,另一方面则利用乡村中既有的社会矛盾,发动周边的“工农群众”配合和参加革命地方武装去攻打“土围子”^②。然而吊诡的是,在实际的斗争过程中,不仅围内“劳苦群众”常常与“豪绅地主”抱团在一起抗拒革命,被动员和组织起来攻打“土围子”的周边“工农群众”以及革命地方武装,也往往出现“怠工”、“开小差”的现象,甚至对“围寨”内的“豪绅地主”采取“妥协”、“放水”乃至“反水”的“非阶级路线”^③。由此可见,在赣南乡村传统的社会生活语境和乡族关系之下,现代性的“革命”、“阶级”话语和策略似乎显得有点“水土不服”,中共革命者前前后后耗费大量人力、物力,经过艰苦的斗争,虽陆续攻破大量土豪围寨,但直到退出苏区之前,也未能有效消除和彻底根绝这些“反动堡垒”对革命的困扰和影响,其根源大概即在于此。对于这一根源,仍然有必要围绕土豪围寨的内部社会构成和社会关系(特别是产权关系)与中共阶级策略之间的矛盾关系进行深入具体的分析。限于篇幅,笔者将另文对此加以探析。

(责任编辑:吴 贇)

① 《红色中华》第二一六期(1934年7月19日)第三版;《红色中华》第二二四期(1934年8月10日)第二版。

② 《临时中央政府给宁都县苏的指示信》,《红色中华》第二十期(1932年5月25日)第六、七版。

③ 饶平《坚决纠正地方武装中的非阶级路线》,《红色中华》第三十五期(1932年9月27日)第七版。